

日军**炮火**下的 **中国文人**

陈虹 著

RI JUN PAO HUO XIA DE ZHONG GUO WEN REN

日本侵华与南京大屠杀研究丛书

南京师范大学“十五”“211工程”建设项目



天津古籍出版社

南京师范大学“十五”“211工程”建设项目

日军炮火下的中国文人

陈虹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军炮火下的中国文人/陈虹著.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 - 7 - 80696 - 430 - 9

I. 日... II. 陈... III. 知识分子—生平事迹—中国—1931~1945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5751 号

日军炮火下的中国文人

陈虹/著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http://www.tjabc.net>

E-mail: tjgj@tjabc.net

天津市宝坻区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25 字数 334000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978 - 7 - 80696 - 430 - 9

定价: 25.00 元

目 录

引 言：有一种财富叫精神	1
张伯苓：炸不垮的“南开精神”	32
梅贻琦：他将惊涛骇浪中的“船”开了回来	51
竺可桢：“流亡大学”的校长	72
张元济：“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	93
郑振铎：“狂牖文献耗中年”	108
陈寅恪：“近死肝肠犹沸热，偷生岁月易蹉跎。”	123
钱 穆：“爱国素不后于人”	142
梁思成：“中国的建筑史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撰写！”	159
常书鸿：“我是敦煌的痴人！”	176
费孝通：“吃得了苦，耐得了穷，才值得骄傲和自负。”	193
朱生豪：为了莎士比亚	211
陶行知：他把爱给了更多的人	227
熊佛西：“你们是我的八十铁军！”	246
马寅初：“言人之所不能言、所不敢者”	263
梁漱溟：“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281
王芸生：“现在是记者利用笔来杀伐敌人的时候！”	299
曹聚仁：“书生有笔曰如刀”	315
曹靖华：“给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	331
胡 风：“愿和读者一同成长”	347
江 村：“即便倒下了，我也面向着敌人！”	365
后 记	382

引言：有一种财富叫精神

在这本书里写的是这样一群人——

他们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但是在凶恶的日本侵华战争中，却沦为了流亡者和难民，过着贫病交困的生活；

他们儒雅雍容，柔心弱骨，但是面对侵略者的炮弹与屠刀，却表现出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他们清高傲岸，洁身自好，但是当自由与民主遭到践踏的时候，却能挺身而出，承担起“匡正天下”的责任；

他们……

—

是的，他们只是一群“文人”、“书生”，或曰“文化人”、“知识分子”……

据某些专家学者的考证，“文人”与“文化人”之间竟然也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一则，“文化人”一词的公开使用是在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其真正的含义是指“从事文化工作的人”，而非前者所谓之“会做文章的读书人”；他们说：“‘文化人’即‘文化工作者’这一概念的出现，标志着我国20世纪30年代以来许多人文知识分子以‘普通人’、‘人民一分子’、‘工作者’的身份，独立自主地走向社会实践，跟劳动群众相结合。”二则，“文人”与“文化人”在价值观上也存在着褒贬之分，他们说了：“我国社会舆论自30年代以来，经常把‘文人’作为贬义词来使用，跟‘迂腐’、‘懦弱’、‘缺德’、‘动摇’、‘自私’、‘寒酸’联系在一起……所以许多人文知识分子耻于‘文人’的徽号，而自

称为‘文化人’则好听得多了！”^①

至于“知识分子”一词，也同样在定义上众说纷纭——不过有两点是可以肯定下来的：首先，它是“外来的、西方的概念”；其次，在它的内涵中有区别于一般读书人的东西：“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这是知识分子词源学上的原意。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与一般的技术专家、技术官僚以及职业性学者是很不相同的。”^②以中国而论，这一“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直至20世纪初叶才真正出现，因为依据帕森斯的观点，知识分子的崛起同两个因素密切相关：一是文字的出现，二是哲学的突破。而后者，更多的是指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或曰“自由意识”与“独立人格”的正式确立。

专门从事这一问题研究的许纪霖，则将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划分为六代。以本书中的人物为例——自最长者张元济起，至最幼者江村止，恰恰代表了他所说的前三代人——即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和后“五四”一代。

晚清一代者，大多出生于1865—1880年之间，如梁启超、蔡元培、李叔同，以及本书中的张元济、张伯苓等人。他们早年接受过系统的、扎实的国学训练，而且一般都具有传统的功名。后来由于受到变法图强的影响，开始重视西学的价值，虽说在思想模式上没有超脱出“中体西用”，但是他们毕竟成为了跨世纪的一代——既是中国历史上最末一代的“士大夫”，又是新知识、新思想、新时代的先驱。

“五四”一代者，大多出生于1880—1895年之间，如鲁迅、胡适、郭沫若，以及本书中的马寅初、梅贻琦、竺可桢、陈寅恪、陶行知、梁漱溟等人。他们幼年之时受到过良好的国学教育，青年之时又大都留学海外，对西方文化有着比较完整的、直接的认知。这一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知识结构，决定了他们既有开放阔大的视野，又于文化心

① 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3、4页，文汇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

② 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第4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态、道德模式等方面保持着中国传统的不少特点。“五四”运动的洗礼，使他们获得了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意志，他们是中国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后“五四”一代者，又可分为前后两批：前一批出生于1895—1910年之间，如冯友兰、潘光旦、闻一多，以及本书中的钱穆、曹靖华、郑振铎、熊佛西、曹聚仁、王芸生、梁思成、胡风、常书鸿、费孝通等人。他们是“五四”中的学生辈，大都具有留学欧美的经历，以及很好的专业训练。如果说前两代人在知识结构上都是“通人”，很难用一个什么“家”来加以界定的话，那么这一代人则是知识分工相当明确的专家。后一批人的出生则又要晚一些，基本在1910—1930年之间，如季羨林、唐弢、顾准、贾植芳，以及本书中朱生豪、江村等人。他们在求学期间受到了“五四”以后新知识和新文化的完整熏陶，几乎是吮吮着这一营养而成长起来的。但相比而言，他们的政治意识似乎更强烈些，而传统文化的影响则相对地要弱少一些^①。

那么，本书中的这些人，究竟又该如何称呼他们呢？抑或说他们是否够得上“文化人”和“知识分子”的标准呢？但不管怎样界定，在这三代人的身上明显地存在着许许多多相同的地方——

第一，精神世界中的忧患意识。

这一群人真可谓是“生不逢辰”，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上便碰到了一连串的“乱世”——出生于1901年的王芸生曾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我是一个中国人，而且正是这个时代的一个中国人，国家在这个时代中的悲喜，我自然也分享了一份。庚子以后的残破局面，已在妈妈的怀抱中过去，童孩的脑中没留下一点印象；我的小辫子是给辛亥革命刺掉的，壬子兵变时的火光与枪声，曾照耀过我的眼睛，震动过我的心；五四运动给我打下一个做人的基础；五卅运动又使我认识了自己的国家。”^②

① 参见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第82—8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② 王芸生《芸生文存·自序》，大公报社1937年第一版。

仅仅半个世纪的年轮,整个社会却基本上没有平静过:庚子、辛亥、五四、五卅……这是他们共同经历过的风云;对于再老一辈的人来说,还有1884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的中日海战、1898年的戊戌变法……张伯苓就曾亲眼目睹过甲午战争后发生在威海卫的“国帜三易”,他形容自己道:“悲愤填胸,深受刺戟。”^①张元济亦曾亲身参加过戊戌变法,还受到过光绪皇帝的召见,但最终的下场却是:“革职永不叙用!”……从清末到民初,整个国家就像是一条千疮百孔的航船,行驶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它前进过,也后退过;它被抛上过浪尖,也被打入过浪底。自1931年起,它更加不幸地成了日本人嘴边的一块肥肉,而我们的这三代文人,也同样不幸地在自己最具生命力的时期,也是学术上最出成果的时期,遭遇到了这场生死存亡的侵略战争,而且其滋味是那样的切肤,是那样的刻骨铭心。

因此可以这样说,是这段特殊的历史造就了这批特殊的文人——忧国情结成为他们共同的印记,爱国情感成为他们共同的底色……作为南开的校长,张伯苓在开学典礼上只问学生三个问题:“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么?”“你愿中国好么?”作为著名的学者,钱穆对自己的老师吕思勉说:“学生自读书懂事以来,就深知要爱国爱民族,爱国素不后于人。”^②

第二,性格作风上的傲岸自负。

有待于内,无待于外,居恭色庄,傲岸狷介,这是这群文人们的共同心态。——马寅初说,他就是要“言人之所不能言、所不敢者”。梁漱溟说:“吾曹不出如苍生何?”陈寅恪坚持“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王芸生更有狂言:“《大公报》就是王芸生,王芸生就是《大公报》!”

当今的学者曾这样分析他们的这一性格:“傲岸于世以示超凡脱

① 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收入《南开四十周年纪念校庆特刊》(1944年10月)。

② 转引自印永清《钱穆 钱承沛 钱伟长》,第8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俗，乃是知识分子必然的心理走向，也是他们人生态度的一种必然选择。尤其对精英分子来说，若没了这份清高自许也就无法迈开最初的一步，无法将自己从俗众中剥离出来，以建立走向学问深处必需的形而上价值标尺。”^①

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傲”，“傲”得有资本；他们“狂”，“狂”得有根基——不论是第一代、第二代，还是第三代的文人们，以其学问来讲，又有谁不是满腹经纶？又有谁不是学贯中西？他们或师出名门，或自学成才；或以西方文化思想为观照，或以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论学术，那是“有思想的学术”；论思想，那是“有学术的思想”。陈寅恪双目失明后，仍然能撰写出多部皇皇巨著；朱生豪重病在身，仍然能翻译出《莎士比亚戏剧全集》；梁思成发誓一定要写出中国自己的建筑史，他果然就写了出来；曹聚仁发誓一定要钻研军事战争史，他果然就成了专家……自信，使他们一往无前；博学，使他们成就斐然。于是那么多的“大师”、“大家”、“大儒”在他们中间产生了——这样的现象于此前不可能出现，因为时代没有提供机会；这样的现象于此后也不可能出现，因为历史没有提供舞台。

第三，价值追求上的“形而上”。

富有“形而上”的精神活动，具有“形而上”的价值追求，这是中外一切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但是对于中国的文人来说，它似乎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自古以来，“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已经成为他们的天然职守；“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已经成为他们的人生价值。为此海外学者徐复观曾经提出这样的观点：对于古代的“士”而言，知识既不是衡量他们的尺度，他们本身也缺乏“为知识而知识”的传统，“因此，把这一群人称为‘知识分子’，实在有一点勉强。我觉得最妥当的称呼是‘读书人’”^②。

① 裴毅然《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与探索》，第5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② 徐复观《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及其历史的命运》，收入《知识分子与中国》，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80年第一版。

因此，当20世纪初“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中国诞生之后，它不仅标志着科学文化第一次获得独立的地位，而且标志着文人们第一次萌发了向知识回归的自我意识。他们开始了对自己的新的角色的认同，也开始了对近代社会中学者之有别于“仕”者的自身价值的领悟；他们的使命不再是“做官”，而是求知识，求真理，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生的知识意义保持一种终极的关切。这便是“形而上”——一种超脱于物质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一种不为世俗所理解的“迂腐”的追求。

有人说，从思想意义上来看，“五四”的真正主帅应该是北大的校长蔡元培，因为是他第一个提出了大学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升官发财为目标。——于是乎，已经出任驻美大使的胡适能够写出这样的信：“至迟到战争完结时，我一定回到我的学术生活去。”^①已经身为中共领导人的瞿秋白也能写下这样的文字：“我很小的时候，就不知怎样有一个古怪的想头。为什么每一个读书人都去‘治国平天下’呢？各人找一种学问或是文艺研究一下不好吗？”^②又于是乎，马寅初这样讲述自己的选择：“国人对于经济二字，素少研究，所研究者多系文学。自经甲午、庚子两役以后，中国赔欠甚钜，大借外债，国人始稍稍注意经济。然财政与金融，在当时能分清楚者，殊不多觐。”^③费孝通则这样谈及自己的专业：“学一门学科总得有个目的。我是想通过学社会学来认识社会，然后改造社会，免除人们的痛苦。”^④……应该说，这正是这三代文人们在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与专业方向时的共同思考与心态：他们要用知识，要用文化，要用“形而上”的专业与学术来报效自己的国家。

① 《胡适年谱》，第549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一版。

② 瞿秋白《多余的话》，收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卷），第70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一版。

③ 马寅初《中国财政之改造》，收入《马寅初演讲集》第3集，商务印书馆1926年第一版。

④ 费孝通《关于人类学在中国》，收入《费孝通选集》，第6—7页，海峡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

就这样，哪怕是战争已经临头，哪怕是死亡的阴影时刻盘旋在四周，他们仍然不愿放弃自己的“形而上”，不愿放弃自己的学术领地。——在西南联大的校园里，金岳霖在写他的《论道》，钱穆在写他的《国史大纲》，冯友兰在写他的“贞元六书”，王力在写他的“语法三书”……在四川南溪的李庄中，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专家们同样在埋头自己的钻研：或是考察彭山的汉墓，或是钻研殷墟的龟片，或是撰写中国建筑的历史，或是分析华夏先人的头骨……在云南呈贡的“魁阁”内，“燕京实地调查工作站”的同仁们也一直在专心致志地研究着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农村经济、基层社区、城乡关系、少数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这就是当年这批文人们的追求，太“形而上”了，太“虚无缥缈”了，太“无关实利”了。但是他们的精神却是实在的、超凡的——“知识分子的形而上特征，其哲学内涵实为价值追求，即黑格尔所说的‘真理是思维的最高目的’。所谓的‘迂’便是不愿向现实低头，宁进寸毋退尺，从而形成一股抗衡世俗的力量。宁可枝头抱香死，不随落叶舞西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宁肯为理想作飞蛾扑火的牺牲”^①。这是一种极其可贵的精神，它不仅代表着“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科学精神，而且也包含着传统文化中一脉相承的人文精神——它的精髓便是：对圣贤人格的追踪，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对天下兴亡的使命感。

为此，在这本书里，在这本包含着三代文人足迹的书里，他们是以这样的一种面目出现的——他们不会呼风唤雨，也不会冲锋陷阵，甚至在某些人的身上还保留着传统文人的“迂腐”和“懦弱”，但是他们却有着一种魅力，一种将忧患意识、傲岸性格，以及“形而上”的价值追求糅合在一起的魅力。它更是一种人格力量，一种悄然而成的蓄积在身体内部的人格力量——马约翰教授称赞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为：“不但是一个真君子，而且是一个中西合璧的真君子。他一

① 裴毅然《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与探索》，第2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切的举措态度,是具备中西人的优美部分。”^①作家叶文玲形容美术大师常书鸿为:“走近他,就像被敦煌天乐缭绕,能深刻地感受到以他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崇高精神,感受到一种极富魅力的文化品格。”^②海外学者余英时则用这样的文字来描述他的老师钱穆:

我跟钱先生熟了以后,真可以说是不拘形迹,无话不谈,甚至彼此幽默一下也是有的。但是他的尊严永远是在那里的,使你不可能有一分钟忘记。但这绝不是老师的架子,绝不是知识学问的傲慢,更不是世俗的矜持。他一切都是自自然然的,但这是经过人文教养浸润以后的那种自然。我想这也许便是中国传统语言所谓的“道尊”,或现代西方人所说的“人格尊严”。^③

二

“战争”、“炮火”、“空袭”、“轰炸”……当这些血淋淋的词汇与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们联系在一起时,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其强烈的反差是不言而喻的。

今天不少的学者都在研究战争,研究战争中的灾难史,然而他们独独忘记了这个群体,抑或说对于这个群体还缺少更加深入的关注。——固然,“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战争来临时,每一个中国人无一能够逃脱它的伤害与摧残,但是在这众多的人群当中,文人所遭受到的灾难应该是最为严重的。自身的“懦弱”与无力,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文化环境所遭遇到的彻底破坏,则将他们推入了死亡的边缘。——文人的工作与其他人不同:必须要有属于自己的参考书籍

① 马约翰《梅校长任教母校二十五年经过述要》,收入《梅贻琦与清华大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

② 叶文玲《敦煌铸就五字碑》,第2页,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③ 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敬悼钱宾四师》,收入《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

和资料，必须要有属于自己的创作空间和地盘——这是指小的文化环境；此外还必须要有报纸、杂志，要有图书馆、资料室、出版社，要有学校、研究所等实实在在的“载体”——这是指大的文化环境。然而，战争却无情地毁灭了这一切，毁灭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毁灭了他们终生从事的事业。

从现有的资料与数据来看，战前文人们的物质生活应该说还是相当不错的，其生活水准均在中等以上——

以教授为例，他们的薪金收入有两大特点：一是级别的晋升较快，二是数额的涨幅亦较大。1927年，一级教授的月薪为500元，一级副教授的月薪为340元；到了1934年，则分别增加到了600元和400元。清华大学自梅贻琦掌校以后，更是为教授们出台了若干的优惠政策，比如说给每人配备一幢住宅——闻一多的“匡斋”共有14个房间；而新建于新南院中的30栋住宅，更是书房、卧室、餐厅、会客室、卫生间、储藏室，以及电话、热水，一应俱全。

以作家的收入为例，北京的报刊多为官办，稿酬每千字4—5元；上海的报刊多为民办，稿酬一般在1—3元，但最高者也能拿到5—6元。至于版税，其标准一般定在10%—25%之间。据赵家璧回忆：“《良友文学丛书》对所有作家都实行版税制，一般都是按售价，作者抽版税15%，一年结两次，交稿和录用时，都可预支一部分。仅对鲁迅作品按20%计，这是上海各书店为尊重鲁迅而共同执行之惯例。”^①

再以报人的收入为例。报馆的最高职务为总理（或社长），其馆主自任者，月薪自定；雇佣者，自200元至400元不等。总主笔、总编辑，月薪为150—300元；编辑主任，月薪为120—200元；特派记者，除交际费外，尚有100元左右的薪水……此外，每到年终，还发有双薪和分红。以《大公报》为例，其总编辑张季鸾和总经理胡正之的月薪为400—500元，“名记”徐铸成的工资则在170元左右。

这样的收入，还有几个数据可以作参照——其一，自1928年起

^① 赵家璧《文坛故旧录》，第44页，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第一版。

到抗战爆发前的十年间,中国的银元、国币和法币一直比较坚挺,物价平稳,基本没有什么变化;以日常生活用品为例:大米 6.2 分钱一斤,猪肉 2 角钱一斤,光面 4 分钱一碗,西餐大菜的套餐为 0.5—1.2 元一份。其二,该时的体力劳动者,月平均工资则在 15 元以下;至于小学教师,河北的统计是,省立学校的月薪为 22—55 元,县立学校的为 14—36 元,上海的标准稍微高一些,但也只有 50 多元。^①

由此可见,战争爆发之前稍有一些名气的文人们在生活水准上已经步入了“小康”。为此他们有更多的钱来买书,买资料,不少人也因此成了“藏书家”。以陈寅恪为例,他曾以 2000 多元的价格购置了一套由日本人刻印的、足有二三百卷数量的《大藏经》,他的学生们这样描述道:“他的书房中各国各类书均有,处处是书,我们进去要先搬搬挪挪才能坐下。”^②再以钱穆为例,他曾颇为得意地说过:“余前后五年购书逾五万册,当在二十万卷左右。历年薪水所得,节衣缩食,尽耗在此。尝告友人,一旦学校解聘,余亦摆一书摊,可不愁生活。”^③

然而,战争却使他们彻底地失去了这一切——不仅包括衣食无虞的生活,更包括那些被视如生命般的珍贵藏书,以及一字一句撰写出来的书稿。曹聚仁的家被征作了司令部,满满一屋子的书籍不见了踪影;郑振铎的藏书则化为了灰烬,他只能仰望空中的纸灰而频频叹息;张元济的损失则更加惨重,由他参与创办的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均毁于一旦,他无比悲伤地说道:“工厂、机器、设备都可以重修,唯独我数十年辛勤搜集的几十万册书籍,今日毁于

① 以上数据来自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文汇出版社 2005 年第一版)和马嘶《百年冷暖: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状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3 年第一版)二书之中。

② 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载台湾《传记文学》1970 年第 16 卷第 3 期。

③ 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第 189—190 页,北京三联书店 1998 年第一版。

敌人炮火，是无从复得，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① 同事们则回忆道：“张先生见到我们，几乎抱头痛哭，呜咽得连话都说不出来。”^②……那天，同样痛不欲生的还有熊佛西，他的两部已经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稿，也随着这一冲天的大火化作了片片的纸灰：“我是一个摇笔杆为生的，我的作品不但是我的生活线，也是我心血的结晶。把我的作品毁了，无异戕杀我的生命。”^③

更有甚者的是，由于逃亡，由于要随着供职的单位西迁，诸多的文人们又不得不成为了流亡大军中的一分子。以高校为例，战前全国共有 108 所，战争中遭到破坏的达 91 所，被迫停办的 25 所，毁灭殆尽的 10 所。为此，依附于它们的这批文人们也不得不随之而向大后方转移。据有关资料统计，“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高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九以上西迁；中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五以上西迁；低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三以上西迁。”^④ 贾植芳曾这样描述该时这些文人们的命运：“……自 1937 年抗战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就进入了另一个时代，再也没有窗明几净的书斋，再也不能从容缜密的研究，甚至失去了万人崇拜的风光。‘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以文化革命改造世界的豪气与理想早已梦碎，哪怕是只留下一丝游魂，也如同不祥之物，伴随的总是摆脱不尽的灾难和恐怖……”^⑤

流亡中的种种苦难，固然被及于每一位逃难者，但是文人们的损失却要远远地超过于其他人之上——因为他们还有书，还有资料，还有自己的研究成果。梁思成逃离北平前，将他和中国营造学社多年来搜集的有关古代建筑的众多照片和资料，寄存在天津的一家英国

① 转引自张树年《我与商务印书馆》，收入《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第一版。

② 王绍曾《商务印书馆校史处的回忆》，收入《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第一版。

③ 熊佛西《写剧原理》，上海中华书局 1933 年初版。

④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抗日战争时期重要资料统计集》，第 339 页，北京出版社 1997 年第一版。

⑤ 贾植芳《狱里狱外·引言》，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5 年第一版。

银行的地下保险柜里,不曾想一场大水竟将他们的全部心血淹没一空。陈寅恪的损失同样惨重,除了那满满一书房的藏书全部沦入敌手之外,他更是于长途的迁徙之中一而再、再而三地遗失了随身携带的各种书籍和资料。平时他有一个习惯,即读书时凡遇到有所得或有所疑者,均提笔标注在书页周围的空白处;等到全书读毕,只需将这些眉批、眉注、眉识等稍加整理,便是一篇鞭辟入里且又新颖独到的论文。因此这些资料的损失,对于他来说有如生命的夭亡,一时间竟“几乎得了神经病”^①。

这些损失——包括精神上的,是无法用数字来统计的。但是退一万步讲,它们毕竟还都属于“看得见”的东西;至于那许许多多“看不见”的灾难,则更不知应该如何来计算了——这便是因战争而带来的经济危机,因经济危机而带来的生活贫困,因生活贫困而带来的健康上的损伤。毕竟他们曾经都属于“高薪”阶层,因此生活水准上的落差则尤其感到显著;更何况数年来的情况是一降再降,竟使他们的生活临近了城市贫民的最低生活线。这是一张有关重庆地区各类人物的工资收入调查表,从中足以见其一斑^②——

年代	大学教授(平均)		产业工人(平均)		一般职员(平均)	
	月薪收入	合战前银元	月薪收入	合战前银元	月薪收入	合战前银元
1936	242 圆		23.3 圆		19 圆	
1937	225 元	212.0	24.0 元	22.6	20 元	18.9
1938	212	176.7	41	34.2	32	26.7
1939	257	130.5	52	26.3	60	30.5
1940	375	61.8	100	16.4	138	22.7
1941	837	42.5	233	11.8	317	16.1
1942	1038	22.7	436	9.6	594	13.0
1943	2826	23.9	1064	9.0	1492	12.6
1944	4588	19.6	3854	16.5	5500	23.5
1945	—	—	14018		26128	

① 《石泉访谈录》,转引自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第 69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第一版。

② 转引自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 221 页,文汇出版社 2005 年第一版。

另外，还有一个资料可以显现出文人们生活水平的下降，这便是1942年10月28日由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会通过的《保障作家稿费版权版税意见书》。在其“缘起”部分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战前最低之发表费为千字30元，而印刷排工千字仅值6角。今在陪都排工竟达千字40元至60元，而稿费则大抵千字未逾30元。一般物价若何增高，姑且不论，仅此稿费与印刷排工比值相差之远，已足窥作家生活之艰苦为何如矣。”^①

因此，这样的生活彻底地摧残了文人们的健康——堂堂的国学大师陈寅恪竟穷得买不起一罐奶粉，长期的营养不良导致他双目失明；年轻的翻译家朱生豪和诗人江村，更是因为无钱治病，最终双双被肺结核夺去了生命……然而，对于文人来说，他们牺牲的还不仅仅是这些——老舍曾说过这样的话：“有人说，我的作品没有战前的那样好了。我不否认，想想看，抗战中，我是到处流浪，没有一定的住处，没有适当的饭食，而且时时有晕倒的危险，我怎么能写出字字珠玑的东西来呢？”^②双目失明后的陈寅恪也不无悲戚地写道：“天其废我是耶非，叹息茆弘强欲违。著述自惭甘毁弃，妻儿何托任寒饥。”^③……作为文人，这样的损失同样让他们痛不欲生。

其实，对于这批智商颇高的“精英”来说，也并非没有其他的出路。当年剧作家陈白尘曾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以他们的才能，如果去投机的话，走向官僚的路，也未尝不可以身居显要；走市侩的路，也未尝不可以腰有百万。但他们根本就没那么想过似的，他们低着头继续着他们为人类服务的工作。”^④更何况，他们还有出国的机会，这又岂非不是脱离苦海的最佳通道？但是梁思成拒绝了，他的“理由”是：“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

① 《保障作家稿费版权版税意见书》，载《新华日报》1942年12月12日。

② 老舍《八方风雨》，连载于北平《新民报》1946年4月4日—5月16日。

③ 陈寅恪《目疾久不愈书恨》，收入《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

④ 陈白尘《岁暮怀朱凡——〈岁寒图〉代序》，载《华西日报》1944年12月3日。